

新译本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古希腊] 修昔底德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古希腊)修昔底德著;徐松岩等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

(世界名著译丛)

ISBN 7 - 5633 - 4320 - 2

I. 伯… II. ①修…②徐… III. 伯罗奔尼撒战争(前 431 ~ 前 404) - 战争史 IV. K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430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 - 64284815

保定市印刷厂印刷

(保定市西二环江城西路 邮政编码:071051)

开本:787mm × 1 092mm 1/16

印张:36 字数:529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 ~ 8 000 定价:6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译 序

修昔底德(Thucydides, 约公元前 460 ~ 前 400/前 396 年), 古代希腊著名历史学家, 以其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而在西方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关于修昔底德的生平, 我们所知甚少。那极有限的一点材料, 主要来自他自己的著作中偶尔提及自己的地方。此外, 还有来自晚后的希腊罗马作家的零星记载。

修昔底德出身于雅典的一个富裕而显贵的家族。他的父亲奥洛鲁斯, 与马拉松战役的主要指挥者米太雅德的后辈以及色雷斯的王族都有亲戚关系。他和公元前 5 世纪中期活跃于雅典政治和社会舞台上的一些头面人物, 如客蒙、伯里克利以及另一位修昔底德(麦里西亚斯之子)等, 大概都多多少少沾亲带故。修昔底德自己提到, 他在色雷斯沿海拥有金矿开采权, 在当地居民中有很大影响(IV.105)。至于他是如何取得这些金矿的, 我们无从知晓。但无论如何, 这样的家庭背景, 无疑为他后来写出名垂千古的史学名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关于他的出生年代, 自古就有不同说法。根据修昔底德自己的记载,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初, 他已经开始撰写这部历史著作了(I.1); 当时他正当明达之年, 能够懂得事物发展的意义了(V.26)。显然, 这时他已是壮年。修氏于公元前 424 年担任将军职务, 这是一个可靠的年代。按照雅典法律规定, 担任此职务者必须年满 30 岁。^① 根据这一点来推算, 他至少应出生在公元前 455 年或此前不久。有的学者估计, 他可能出生在公元前 471 ~ 前 455 年之间;^② 有的学者推算, 他大概出生在公元前 460 ~ 前 455 年之间。^③ 他在青少年时代和雅典的许

①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Aristotle,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s*), IV.3~4。

② 参阅 R.M. 胡特琴斯总主编:《西方世界名著》(R.M. Hutchins,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第 6 卷, 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 伦敦, 1988 年版,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R. 克劳利(Crawley)英译, R. 费萨姆(Feetham)校订, 以下简作“克译本”]之序言。

③ N.G.L. 哈蒙德等主编:《牛津古典辞书》(N.G.L. Hammond,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牛津 1984 年版, “Thucydides”条。

多贵族子弟一样,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公元5世纪的马赛林努斯提及一个故事,说修昔底德在童年时代,随父亲一起聆听希罗多德朗诵其历史著作时,曾感动得流涕。希罗多德看到这个情况,对他的父亲说:“奥洛鲁斯,你的儿子深受求知欲的感动。”^① 这个故事的细节未尽可信,但从中可以想见希罗多德对修昔底德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而后者对前者的著作颇为熟悉,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

从公元前431年战争爆发起,到公元前424年他任将军止这7年间,修昔底德大概一直居住在雅典。他自己说,这时他已经开始搜集有关材料,以撰写这场战争的历史(I.1)。他明确指出,公元前430年雅典瘟疫肆虐之时,他自己也染上此病(II.48),而当时这种病在希腊其他地方似乎很少流行。他又说到,他的著作中所援引的演说词,有些是他亲自听到的(I.22),尤其是伯里克利的演说,他一定是多次听到过的。这也只有住在雅典才有可能。其间,他也有可能住在色雷斯经营他的金矿。公元前424年,他当选为雅典十将军之一(IV.104)。此前,他可能参加过一些战役,否则不会陡然取得这样高的地位的。这年冬天,斯巴达名将伯拉西达统率远征军,在色雷斯人的协助下,向雅典人在色雷斯地区的战略重镇安菲波里斯发动进攻。此时修昔底德正驻扎在塔索斯。安菲波里斯守将攸克利斯向他求援,他迅即率7艘战舰驰援。然而,当他赶到时,守将已降,安菲波里斯已落入敌手(IV.106)。显然,安菲波里斯的失陷,责任不在修昔底德。可是,在雅典,有人诬陷修氏,说他有通敌之嫌,雅典民众因此议决把他放逐。在此后蒙冤受辱的20年里,他充分利用闲暇时间,在希腊世界,特别是在那些敌对国家广泛游历,收集到多方面的史料(V.26)。其间他一定经常前往伯罗奔尼撒各地以及西西里进行实地考察,尤其注意考察那些发生过重大战役的地方。雅典和阿尔哥斯、曼丁尼亚以及爱利斯所签订条约的内容(V.47),可能就是他从奥林匹亚的石柱上抄录下来的铭文,因为他的著作中记载与考古发掘出来的铭文内容基本相同。^② 关于曼丁尼亚战役的史料(V.69~74),则完全是从伯罗奔尼撒方面得来的。他肯定去

① 参见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以下简称“谢译本”),译者前言,第10页。

② 参见谢译本,译者序言,第12页。

过西西里,否则在描述西西里的战事时,他对于西西里的地形不会如此熟悉;关于雅典人在西西里惨败的情况,他是从雅典的俘虏口中得来的。

修昔底德在流亡 20 年后重返雅典(V.26),并且知道公元前 404 年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长城被拆毁一事(I.93)。他对公元前 396 年以后的事情全未提及,但提到死于公元前 399 年马其顿国王的改革(II.100),因此,大约在公元前 400 到前 396 年之间,他未能按计划完成其著作而猝然死去。^①

修昔底德的这部著作是世界历史文库中的一部杰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整个结构合理、紧凑,文字简洁、流畅、生动,富有哲理和感染力,显示了作者出色的史才和良好的文化素养。全书被后世学者分为 8 卷,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展开史事,各卷之间保持着必然的联系。第一卷开头有一个序言,阐明作者的写作动机、方法,接着勾勒了战前希腊历史的轮廓,追溯了雅典人与拉栖代梦人之间矛盾的发展过程;第二、三、四卷至第五卷第 24 节,记载战争的前 10 年(所谓“阿奇达姆斯战争”),即自战争爆发至“尼基阿斯和约”的签订;第五卷第 25~116 节叙述“尼基阿斯和约”的签订至西西里远征,即所谓“和平”时期的史事;第六、七两卷叙述西西里远征始末;第八卷叙述战争最后阶段,即狄凯里亚战争和伊奥尼亚战争。按修昔底德自己的计划,他的历史著作将一直写到公元前 404 年雅典长城被拆毁和比雷埃夫斯港被占领为止。但是他的著作只写到公元前 411 年冬天,就突然中断了,最后一句话也是不完整的(VIII.109),说明他的著作尚未完成。

修昔底德生活的时代,是他的祖国雅典盛极而衰的时代。波斯战争^②以后,尤其是公元前 5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后,雅典利用其强大的海上势力控制了东地中海地区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把原提洛同盟诸邦逐步降至附属国的地位,雅典与原同盟者的关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形成古代世界历

① 关于修昔底德死亡的原因和年代的讨论,参见谢译本,译者序言,第 13~14 页。

② 关于波斯战争结束的时间,学界的看法不尽一致,主要有公元前 449 年和前 479 年二说。笔者更倾向于后一种说法。

史上第一个大规模海上霸国——雅典帝国。^①从此,雅典国家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已由阿提卡半岛的蕞尔小邦一跃成为地跨欧亚、囊括爱琴海的泱泱大国,焕然一新的雅典城成了东地中海地区政治、经济、海陆交通和文化中心,成了“希腊的学校”。雅典人对包括奴隶在内的原提洛同盟诸邦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是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兵源充足的最根本的原因。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成人的修昔底德,作为统治阶级上层的一员,作为雅典对外侵略扩张战争的实实在在的受益者,对此自然有着深刻的体会。在思想文化领域,希腊朴素的唯物论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们不懈的探索,人本主义思潮的流行,如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希波克拉特斯的医学成就,普罗塔哥拉斯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希罗多德的历史研究成果,以及演说术、诡辩术开始盛行,悲剧、喜剧频频上演……这一切,都不能不给修昔底德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治学方法以深刻的影响。雅典民主政治为人才荟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修昔底德的史学成就达到了希腊古典史学的顶峰。

首先,他发展了人本主义历史观。在古代希腊,即使像希罗多德这样的史学家,虽已初步能够以人本史观观察历史,却也难免受到“神命史观”的影响,常常有意无意地以天命、神意来解释历史。而修昔底德彻底摒弃以征兆、占卜、神意来解释历史的做法,试图完全从人本身来解释历史,这标志着古典史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不仅如此,他还努力用科学的方法去说明自然现象(日食、月食、地震等),而不把它们视为吉凶的预兆。他痛心疾首地斥责雅典远征军的统帅尼基阿斯因日食而耽误撤军日期;他认为神谕是一种骗术,有的神谕是因发布者接受了贿赂而捏造出来的;等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修昔底德从人的本性出发来探讨战争爆发的原因。他认为战争的起因是人的贪婪,是狂热地追求权力和占有欲,这是一种任何权力和财富都无法满足的狂热。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之间爆发战争,并不是因为二者之间的不同,如民主制和寡头制的对立,而是因为二者的

^① 如何认识雅典同盟和雅典帝国,学者们意见各异。参见徐松岩:《关于雅典同盟的几个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论雅典帝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共性,即无休止地追求权力(Ⅲ.45,82)。^①这是相当深刻的见解。修氏认为,既然人的本性始终如此,历史也同样会不断重演,因而其著作是永远不会失去其价值的。修昔底德十分重视人的力量,他概括地论述了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强调人的重要性(Ⅰ.143)。在他看来,正是雅典人,包括他们的先辈、同辈,也包括那些已经长眠于地下的烈士们,共同创造并赢得了当时雅典的一切。当雅典的西西里远征军陷入绝境时,他又借尼基阿斯之口说:“组成城邦的是人,而不是那些没有人的城墙和舰船。”(Ⅶ.77)修氏特别强调人的主观意识的历史作用。他借伯里克利之口,把雅典帝国的伟大、光荣和富强,归功于先烈们的“勇敢精神,他们的责任感,他们在行动中有一种强烈的荣誉感……他们认为幸福是自由的成果,而自由是勇敢的成果,他们从不在战争的危險面前退缩”(Ⅱ.43)。此外,他还特别关注人(包括个人和集体)的心理状态,这在关于科基拉革命和西西里远征等事件的记载中皆有所描述(Ⅱ.64~65;Ⅳ.55,65;Ⅶ.71)。

其次,发展了求真精神,力图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因果关系。修昔底德受到自米利都学派以来朴素唯物论者的影响,以近似唯理主义的精神对待历史,探索历史的因果关系,探索人事的规律。在述及特洛伊战争的原因时,他不认为那是因特洛伊王子拐骗了全希腊最美的女子海伦所致。在他看来,阿伽门农之所以能够募集大军远征特洛伊,不是由于王公们对他的忠顺,而是由于王公们对他的畏惧(Ⅰ.9)。在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时,他以较大的篇幅论述了雅典人和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之间的矛盾,指出,由于雅典势力的不断增长,引起了拉栖代梦人的嫉妒和恐惧,而科基拉事件只不过是战争的导火线。这样就明确指明了战争的远因和近因,把战争的基本原因和偶然借口区别开来。特别是在一个历史事件尚未结束时,他就能从整体上考察它的进程,而且没有一处是归于偶然性或不可知的超自然因素的。修氏在考察历史进程和探索历史事物因果关系方面的卓越才干,至今仍为人们所叹服。

第三,初步具有历史进化论思想。他在考察此前希腊历史时,明确指

^① 参见伊迪丝·汉密尔顿:《希腊方式——通向西方文明的源流》,徐齐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6页。

出,“过去的时代,不论是在战争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都不是伟大的时代”(I.1)。他认为远古时期没有定居的人民,没有商业,没有城市,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出现是文明和进步的标志。修昔底德能够认识到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并且有一定的规律性,指出,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政治上,“新陈代谢是不可逆转的”(I.71)。正是基于这种进化论思想,他在研究历史现象时,能够初步运用反溯推理法,即按现在社会生活中保存的遗迹来推断历史上的情况。例如,他从当时许多希腊人仍保留随身携带武器的习惯,推断古代劫掠之风盛行于海上和陆地上(I.5~7);他根据雅典最古老的庙宇都在卫城内,推定雅典的城区最早仅限于卫城一带,后来城区的范围才逐步扩大(II.15)。

第四,认识到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修氏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位明确意识到历史进程必然受到社会经济生活制约的历史学家,他还试图从经济关系上解释历史的进步与发展。他在考察希腊早期历史时,总是处处结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他指出,远古时期人类四处漂泊,当人们的生活有了节余之后才过上定居生活。他不同意《荷马史诗》中关于特洛伊战争规模的描述,认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资金缺乏和给养不足,不可能有那么大的一支军队(1200艘战舰,10万将士)。^①他还正确分析了经济因素与战争成败之间的关系,认为特洛伊战争之所以延续10年之久,不是由于希腊方面人数不足,而是由于经济资源匮乏;如果希军给养充足,他们会很容易取胜的。在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他多次强调维持长期的战争须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因而对雅典的岁入和贡赋的情况始终予以高度重视。他写道,属邦所缴纳的金钱就是雅典势力的源泉,战争的胜利主要依靠明智的决断和经济资源(II.13)。

第五,创立了比较科学的治史原则。修氏是西方史学史上第一位真正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实态度的历史学家,他非常重视历史证据,重视对证据的批判,力求使自己的叙述与客观事实相符合。为此他提出了严格的史料批判原则,长期以来曾被无数学者所援引。他说:“在叙事方面,我绝不是一拿到什么材料就写下来,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观察就一定可靠。我所

① 参阅徐松岩:《关于特洛伊战争的若干问题》,《世界历史》,2002年第2期。

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击其事的人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我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方法检验过的。然而,即使费尽了心力,真实情况也还是不容易获得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会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而记忆也不一定完全可靠。我这部没有奇闻逸事的史著,读起来恐难引人入胜。但是,如果研究者想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借以预见未来(因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未来虽然不一定是过去的重演,但同过去总是很相似的),从而认为我的著作是有用的,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I.22)他就是以如此严格批判的原则处理史料的。因此,他十分重视采纳第一手资料,坚决摒弃那种拼凑故事以迎合读者的做法。他不辞辛苦地奔赴各地,进行实地考察,从而对战争中所涉及的山丘、河谷、沼泽、港口、关隘等都作了具体而准确的记载;同时从事件的目击者那里也取得许多可靠的资料。在流亡期间,他利用自己不被敌人怀疑等有利条件,在伯罗奔尼撒及西西里等地考察,获得了许多宝贵的史料。1877年出土的一块石碑,上面刻有公元前419年雅典与阿尔哥斯等邦缔结条约的铭文。考古学家把它与修昔底德的记载相对照,二者竟相差无几。因此,《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史料的可信性方面,堪称史学史上的典范。

第六,修昔底德的文字表达艺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的叙述客观冷静,生动而真实。他本人是一位有实际经验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叙述一场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的场面,或者在叙述扣人心弦的战争场面时,就显得游刃有余,给读者亲临其境之感。例如在叙述科基拉的流血冲突(III.69~81),在叙述雅典民众拆毁“四百人”政府在比雷埃夫斯所构筑的城墙时(VIII.94~95),都展示了政治斗争的紧张而惨烈的场面;在描写雅典人和叙拉古人在大港中进行最后决战时(VII.60~72),把双方将士的心理状态和殊死搏杀的场面有机结合起来,使读者与其共呼吸。修昔底德还巧用对比法,使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在他的笔下变得清晰可辨,一目了然。例如伯里克利在战争爆发前夕,把雅典人的资源和拉栖代梦人的资源加以对比(I.139~144);在著名的葬礼演说中,他把雅典人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与斯巴达人的加以对比(II.37~42);他还借科林斯人之口,把斯巴达人的保守怠惰与雅典人的冒险进取的特点加以对比(I.68~71)。修昔底

德还避免了同时代的一些文艺家和修辞学家为增加文字的优美而过于计较字句的对偶和结构的平衡的缺点,他常常能够从大处着眼,给读者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例如他先写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慷慨陈词,讴歌雅典的光辉灿烂,接着就是雅典瘟疫肆虐,死亡枕藉(Ⅱ.35~58);先讲雅典的西西里远征军开拔时盛况空前、气冲霄汉,接着就是数万将士一败涂地,全军覆没(Ⅵ.30~31,Ⅶ.36~87)。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演说词的运用是修昔底德著作的最突出的特色之一。这些演说词大约占其著作篇幅的四分之一。修氏写道:“在这部历史著作中,我援引了一些演说词,有些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发表的,有些是在战争期间发表的。有些演说词是我亲耳听到的,有些是通过各种渠道得到的。无论如何,单凭一个人的记忆是很难逐字逐句记载下来的。我的习惯是这样的:一方面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各种场合所要求说的话,另一方面当然要尽可能保持实际所讲的话的大意。”(Ⅰ.22)这就是说,有些演说词是他亲自听到的,如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有些可能是他听别人说的,如在拉栖代梦同盟大会上科林斯人、雅典人以及阿奇达姆斯的演说词;有些是他根本不可能听到的,如赫摩克拉特斯在革拉会议上的演说词。修昔底德巧妙地运用这些历史人物亲口说出的言辞来说明他们行动的背景和动机,其作用正如雅典悲剧中合唱队的作用一样。^①修氏的这种表现手法很明显地是受到悲剧的影响。

最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史书编撰体例上较希罗多德的《历史》更加完善,这种以年代为主线的历史叙事体的编撰体例,以及注重军事和政治的撰史传统,对后世欧美史学的发展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②

当然,修昔底德的著作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近代以来,有学者认为修氏著作的最大不足是“主题狭隘”,说他在叙述这个时代的历史时,把叙述范围严格地限制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对于精神文化

① 在悲剧上演时,演员在舞台上表演到情节紧张、达到高潮的时候,或者要加强动作的力量、说明动作的动机的时候,都是借合唱队的歌唱来表达出来的。

② 从罗马史家中的萨鲁斯特、阿里安、塔西佗等,中古拜占廷史家普洛科匹阿斯,直到文艺复兴以后的人文主义者,特别是19世纪客观主义史学风靡西欧,历代研究者普遍注重军事和政治的记述,而修氏的史学方法和观点,一直受到西方史学界广泛的重视。

方面的成就,则鲜有涉及。^① 这种看法是从现代研究者的需要出发而提出的,似乎有欠公允。国内有些学者常常指责修氏用抽象的“人性”来解释历史,对此似乎应作具体分析。因为实际上他的人性论是其人本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因而也是其朴素的历史唯物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他看来,人性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包括占有欲、权力欲、虚荣、贪婪等具体内容的。修氏在述及科基拉革命时对此作过比较集中的阐释(Ⅲ.69~85)。他指出,在和平与繁荣的社会条件下,城邦和个人尚能遵守比较高尚的准则。但是,当战争和内乱导致人们生活困苦、心志降低时,人性的恶的一面就恶性膨胀,并且一发不可收拾,从而出现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暴行。其表现在:“夺取政权更加阴险狡诈,报复政敌更加残忍无忌”;社会良知尽失、道德沦丧;鲁莽即勇敢,谨慎即懦弱,阴谋成功是头脑精明的表现;“夸夸其谈的人总是被信任,而反对他们的人总是受到猜疑”;复仇比自卫更重要;一切规则和法律都可以违反,所有条约和诺言都可以背弃;混乱中那些最粗俗的人最有生存能力,因为他们不瞻前顾后,敢于鲁莽行动。当然,修氏认为并不是所有介入政治斗争的人皆出于个人目的,有时一些人疯狂地投入动乱不是为了图利,而是因为不可遏止的一种激情。这样,修昔底德实际上是力图从人性和人性之外的社会存在来寻求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答案。^② 但由于这种观点的出发点是人性不变论,因而它在本质上又是形而上学的。

关于修昔底德的政治立场,有的学者认为他“站在奴隶主民主派的立场上,赞成民主政治,反对贵族政治”,“同情伯里克利派的温和民主党,反对激进民主党”。^③ 有些学者则盛赞他的如实直书的客观主义精神,说他“从不党同伐异;如果不是他自己经常提及‘雅典人修昔底德’的话,天真的读者有时会弄不清他是哪国人士”。^④ 实际上,修氏以其特有的冷静的史

① 参见《不列颠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伦敦1980年版,“Thucydides”条。

② 参见徐松岩、李电:《修昔底德和平思想初探》,《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③ 参见谢译本,译者序言,第35页。

④ 参见《劳易卜古典丛书》,修昔底德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英译本[4卷本,英译者C.F.史密斯(Smith),以下简称“斯译本”]序言,哈佛大学1977~1980年版,第18页。

笔,寓褒贬于叙事。这是考察其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此我们必须首先对雅典国家的阶级结构及其发展演变作一简要分析。众所周知,公元前7世纪末以后,雅典城邦(公民集体)内部诸集团、诸阶层之间经过长期的错综复杂的磨合和斗争,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断得到调整,他们的共同利益逐步大于他们的矛盾和分歧,而这也正是雅典不断向外扩张并且获得成功的内在原因。波斯战争以后,雅典人利用他们在雅典同盟中的有利地位,逐步剥夺原提洛同盟诸邦的主权,侵占其领土,使雅典国家的版图不断扩大,人口激增。亚里士多德指出:“由于国家日益壮大,而钱财也敛聚了很多”,雅典当政者“就劝告人民,放弃农事,入居城市,务以取得领导权为目的……人民采纳了这种劝告,并获得了霸权,于是对待盟邦,更加专横”;“他们又按照阿里斯提德斯的建议,为大众准备充足的粮食供应,因为贡金、征税和盟邦捐款的综合所得,足以维持2万多人的生活”^①。公元前5世纪70~60年代雅典民主制的发展,是雅典国家机构强化的集中体现,也是雅典奴隶制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实质是雅典人对异邦人(非雅典人)的压迫和剥削逐步得以巩固和加强。到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国家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雅典人内部诸集团之间的矛盾,而是雅典人同众多异邦人之间的矛盾;对于雅典帝国内众多的臣民和奴隶来说,“雅典人”不仅仅是指雅典公民集体,还意味着他们是集体的奴隶主,集体的统治者。修氏在他的著作中有时使用“统治着帝国的城邦”,有时把城邦(公民集体)与君主相提并论(II.63,65; VI.85),显示出他对现实的极为深刻的认识。

毫无疑问,修昔底德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他热爱的是雅典城邦,是雅典的公民集体。因此,凡是对雅典人有利的他都衷心拥护,凡是不利于雅典人的他都极力反对。修昔底德就是站在这样的政治立场上,对于大权在握、左右政局的伯里克利赞赏有加,对于伯氏死后雅典政坛争权夺利、群龙无首的局面忧心忡忡;同时,他对于民主政治的某些弊端提出尖锐的批评,而对于统治阶级或公民集体内部所达成的和解则深表赞同和支持。他在评述公元前411年“四百人”政府被政变者取代这一历史事件时,写道:“在

①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Aristotle,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s*), XXIV.1~3。

这种新宪法实施的初期,雅典人似乎有了一个比以前都要好的政府,至少在我的时代是这样的。因为它使少数的上层阶级和多数的下层民众之间的斗争得到适当的和解,这种和解首先使国家在历经劫难之后,能够重新振作起来。”(Ⅷ.97)可见,一方面,他认识到这场战争事关雅典人的荣辱和命运,按他对人性的理解,战争的爆发就是一场“悲剧”上演的开始,悲剧的主角自然是雅典人;另一方面,他又竭尽所能为雅典的内外政策作辩解。他在著作中援引和编写大量演说词的做法,恐怕不宜简单地归之于时代风尚的影响。其实,著名史家波里比乌斯(约公元前204~前122年)就曾对这种做法提出批评,认为史家应当如实记载演讲者所说的话。^① 修氏在很多场合是通过历史人物的对话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如战争爆发前雅典人在斯巴达的发言(Ⅰ.73~78),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关于米提列涅人的命运的辩论(Ⅲ.37~48),雅典人与米洛斯人的对话(V.85~113),等等。贯穿于这些演说词的一个核心思想是:雅典人是强大的,是有资格统驭臣属诸邦的,而弱者屈从于强者是天经地义的。^② 而修氏在追述雅典帝国形成时,竟然认为雅典人逐个剥夺原提洛同盟诸邦的主权,“同盟者自己也有过失”(Ⅰ.98~99)。还有,雅典人明明是以武力强占塔索斯的土地尤其是其金矿,而修氏却曲解史实,把它说成是雅典人和塔索斯人对“矿产的所有权发生争执”,从而引发后者的暴动(Ⅰ.100~101)。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奴隶主阶级的强盗逻辑。大概也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虽然修昔底德深知经济因素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却似乎有意忽略了有损于雅典“形象”的某些重要史实。例如公元前454/前453年雅典人把原提洛同盟金库移至雅典,实际上是直接侵吞同盟诸邦的巨额的公共基金(据估计其数额不下5000塔连特^③)。属国的贡金是伯里克利时代雅典人大兴土木和军事扩张的主要财源,在当时也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公元前427/前426年,雅典

① 波里比乌斯:《通史》(Polybius, *The Historiae*), Ⅱ.25a。

② 亚里士多德也有类似的看法[参见《政治学》(Aristotle, *The Politics*), 1255^a6]。

③ 塔连特是古代西亚和希腊地区的重量或货币单位,依地区、时代或国别不同而价值各异。雅典初用埃吉那制,梭伦改革时始采用优波亚制。在雅典,公元前5世纪后期实行银本位制,1塔连特=25.86千克,1塔连特=60明那=6000德拉克玛,1德拉克玛=6奥波尔。1德拉克玛大约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两日的生活费用。

人为了筹集军费,大大提高了属国贡金数额,由战前年均 600 塔连特增至 1300~1500 塔连特,^①这在面向公众上演的戏剧中亦有所反映。^②作为国家最高军政首脑之一的修昔底德,绝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

那么,修氏“主题狭隘”以及“忽略”若干重要史实的真正原因何在?有学者辩称,修昔底德既然记述的是一部战争史,并非“记述一个历史的时代”,他把主题严格限定在战争的范围内,恰恰是修氏的胜人之处,是该著作的优点。^③这种说法自然不无道理,但是细分析则似乎与事实不尽相符。因为我们既不应以今人的需要去苛求古人,也不应把现代的某些观念生搬硬套到古人身上。如前所述,修氏实际上是要通过描述和探索纷繁复杂的人事,力图揭示出一种人性共有的、具有永恒教益的知识。^④因此,那种认定他自己把叙述的主题严格限定在战争范围内的观点,似乎是缺乏充足依据的。事实上,从修昔底德著作的主题^⑤来看,他也不应对此完全忽视。事实上,那些被伯里克利称为“帝国的标志和纪念物”(II.41)的雅典城内的众多宏伟建筑,个个都是雅典人剥削、奴役异邦人的明证,因为这些标志着雅典文化成就的宏伟建筑的浩大开支,几乎全都来自他们所侵占的原同盟者的公共基金。这很可能就是修昔底德对此讳莫如深的真正原因。公元前5世纪雅典文化繁荣的社会物质基础是奴隶制的大发展。也许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恩格斯所说的话:“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⑥

另外,修昔底德的纪年方法欠准确。作为一部编年体史著,作者除指

① 参见哈蒙德等:《牛津古典辞书》,第320页;普鲁塔克:《传记集·阿里斯提德斯传》(Plutarch, *The Parallel Lives, Aristides*), XXIV.3。

② 阿里斯托芬:《马蜂》(Aristophanes, *Wasps*), 第655~660行。

③ 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④ 参见:R.G.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34页;伊迪丝·汉密尔顿:《希腊方式》,第154~157页。

⑤ 后世学者把修氏著作译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或《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雅典斯巴达战争史》,而其古希腊原文意为“修昔底德的调查研究(的成果)”。

⑥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0页。

出年份以外,通常只用“冬季”和“夏季”来纪时。为了精确起见,他还采用当时希腊流行的其他纪年方法加以印证,如某人担任执政官或监察官或祭司之年。这种纪年方法在当时是最准确的(V.20),但它往往不能给人明晰的时间观念。不过,这种纪时方法既然与当时希腊流行的纪时方法相一致,因此只能说是时代使然。

总之,修昔底德及其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吸收和继承前人史学成就的基础上,把古希腊史学推向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他的朴素唯物论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徐松岩

2003年6月

目 录

第一卷

第一章	从远古时代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前的希腊国家。·····	(3)
第二章	战争的起因。爱皮丹努斯事件。波提狄亚事件。·····	(16)
第三章	拉栖代梦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	(34)
第四章	从波斯战争结束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从霸国发展到帝国。···	(47)
第五章	拉栖代梦的第二次同盟大会。战争的准备和外交摩擦。 基隆。波桑尼阿斯。泰米斯托克利斯。·····	(61)

第二卷

第六章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第一次入侵阿提卡。 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	(81)
第七章	战争的第二年。雅典的瘟疫。伯里克利的立场和政策。 波提狄亚的陷落。·····	(104)
第八章	战争的第三年。普拉提亚之围。佛米奥的海战胜利。 西塔尔克斯统率色雷斯人入侵马其顿。·····	(118)